

幼 狮 文 化 书 系

日 本 教 习

汪向荣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幼 狮 文 化 书 系

D829.313

W.085

日 本 教 习

汪向荣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教习/汪向荣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幼狮文化书系)

ISBN 7-5006-3781-0

I. 日… II. 汪…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5356 号

书 名 日本教习

著作权人:汪向荣

责任编辑:潘平

封面设计:颜雷

出 版 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E-mail:cyph@eastnet.com.cn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发 行: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图书发行部

电话:010 64010813 传真:010 64033760

印 刷: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40mm×203mm 1/32 印 张:10.25 插 页:2

字 数:217 千字

版 次: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500 册

ISBN 7-5006-3781-0/K·447

定 价:16.00 元

修订版序

在这新世纪来临,和我进入八十春秋的时候,能重新修订《日本教习》问世,衷心感到无限欣慰。因为“日本教习”的研究,可以说标志着我毕生的研究生涯的开始;几十年来,我从未放弃过对其修订和补充,即使在我名入另册的三十年中。现在当我退出研究岗位十五年之际,再度对之加以修订、补充,怎能不高兴。

回首往事,实不胜感慨。

四十年代初,和实藤惠秀先生稔熟后,我就提出他所写《留日史稿》中的日本教习一章要补充,要增加内容。因为这是中日文化交流中极为重要的史实,也是不能忘却的史实。他同意了,我们就为这一章的改写定下计划,主要的是充实名单。这样,我们两人一有时间就一同上图书馆,逛旧书店、书市,查找旧书刊,以补充遗漏的名单;还通过种种关系,走访一些当年在中国当过教师的人,这样增补了一些,但不多;后来觉得在日本遗留的资料,不可能还有很多,而当年他们活动地点在中国,必定还有不少资料可以找到;加上当年受过日本教师教育的人,在中国也还有;所以决定,他放弃此项研究,由我回国后继续从事。

按事情的正常发展而论,应该是这样的。实藤先生,他在对中国留日教育史的研究中,删去了“日本教习”这一项,以后他增订的

F-16 62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里面，就没有这一部分。我回国以后，也的确补充了些当年日本教习的名单，对他们的活动和成绩也了解了部分。但想不到，没有多久，我就失去了从事调查的机会；以后又名列另册，一切都不可能了。这样尽管我的其他研究没有中辍，可对日本教习的研究不可能不中止了。丙午年初秋，一个由日本大学教授为主的代表团来，那时我还能见到他们，为怕自己一生钻研的资料丢失，所以把几经补充的名单副本托一位旧知带给实藤氏，请他保存或在此基础上赓续研究。

1977年他见到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短文后，很快来了信，得到我回信后，他又来信重提研究日本教习之事。说目下在日本已很少人知道此事，在中国怕也如此，因此建议我尽快恢复此项研究。当我告诉他所存的资料、照片已荡然无存时，他又很快来信，不但把丙午托存的名单，而且还把四十年代一同搜集到有关照片的副本一并寄了来，使我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度开始。

进入八十年代，我已有可能搜集资料，并且把研究深入了一步。为了害怕这批资料再度沦失，所以以名单为核心，写了一篇文章送出，希望发表。这样不但告诉同好，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时，曾经借重过日本教习，而且也能因之而将名单印刷颁布；可是，很快就得到他们以“事隔久远，无从核实”为由而退了回来。没有办法，我转送香港，在中文大学谭汝谦氏的斡旋下，《明报月刊》发表了论文部分，名单因为太长而略去了。这一事实使我知道，对日本教习的研究，还是必要的；而全文的发表，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1985年，我准备退出研究岗位时，整理了已写出的研究成果，日本教习部分作为最后一批送交了出版社（由出版先后而论，这不是最后的。但送出是最后一批）。1988年《日本教习》初版本在北京问世；出版的目的，我是想保存这些资料。可是想不到这书出版后颇受欢迎，不像我的其他著作，曲高和寡。1989年，出版后方一年，我在京

都,几位日译本译者要我为他们设法找几本,因为他们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都说售缺了,可是我也遍找无着,只能让他们用复印件工作。以后,日译本出版,也很快就售罄,这是我想不到的。

日译本是由竹内实教授监修,三位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同学翻译的(以后由于篇幅限制,楠原俊代女士所译部分——《神户理事府》未能收入)日译本中的教习分布表,比原版的要翔实,要多;因为不但我作了补充;而且对教习的姓名等,还由几位译者逐一核对、纠正。所以这次修订本的名单,就是以日译本为基础增补的。

日译本的印数比原版增加了一倍,但出版后仍不到一年就全部售罄。不少人因需要而写信给竹内教授,甚至直接向我索要的。这情况表明,尽管这一段历史过去没有被中日双方所重视,但还是需要的。这次的修订重印,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修订中,有几点需要说明的:

首先,在原版最后(指的是中文本原版,下同)一篇资料《明清之际任译司归化家族》抽删了,因为一则和本书其他各文内容不一致,虽然说,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在研究日译本内容取舍时,一再主张保留此文,但竹内教授最后也以与全书不一致而主张删除。其次,此文原是我年轻时摘录的读书笔记,不是什么研究成果。当时《译司统谱》这书,不但图书馆中有,就连旧书店中也可找到;可五十年后,再到日本时,一般图书馆馆藏书目中已找不到其名,旧书店中当然也不会有了。相信除极个别人以外,不会有人去研究了,但有志研究者,还可以查到原书的,所以抽删了作为资料附入的此文,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神户理事府》一文,本也想抽去的,可此文所述,不但年代较近,而且对两国建交初的情况和民国以前历任理事的沿革,目下除此文外,也没有见有谈及的,因此作为参考的史实,仍保留了下来。

其他各文,多少作了些修订,增补。其中改动最大的,当推《日

本教习分布表》。现在发表的名单，比最初实藤先生所制的，大概要多出四分之一左右，原表中的错误也相应纠正了不少，当然这分布表仍可能有遗漏和错误，仍希望提出修正。

有一些事实是在原书出版后发生或者在日译本出版后发生的，但其重要性却不能漠视，例如中日两国人民在八十年代前后对一个当时作为日本教习到中国来执教，以后又毕生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松本龟次郎先生的纪念活动；虽然他本人已作古，但这些纪念活动却对日后两国友好关系是有影响的，因此对有关章节作了相应的修改、增补。

此文，还添加了一些有关的图片。很遗憾的，有些图片极足以说明和反映当时情况的，例如日本教习教课时的情形，神户理事府移交牌籍（户籍）给日本地方官后的复照等；过去发表有关文章时还曾用过，可现在已无法找到，只能付诸阙如。特别要提出的是“笔谈”中两张照片，是实藤先生根据实物所照，和以后郑子瑜先生由缩微片放大的，并不相同，这两张照片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了。正如当年我见到的笔谈稿中夹有烟叶以防蛀的原件一样，回忆起来，都极珍贵。

日译本的监修者竹内实教授在日译本中写了篇《后记》，长达二十页左右（日文计算，以400字一页的稿纸为准，二十页译成中文约6500字左右），写得很好，不但对日本读者有用，就是对年轻的中国读者亦极有用。他不仅介绍了书中各文的背景，而且也述及两国文化交流失败的所以。原来想译出附在修订版中的，但由于文中有不少部分是对我本人有过誉之处，这样就不能不割爱。

最后除了对修订版中利用过材料的各位表示谢意外，还想提一下，由于我辍笔已十五年，而且行年八十，精力日衰，笔下不免有重复或难达辞意处，请原谅。

汪向荣

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日

目 录

修订版序

前 言	(1)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	(8)
日本教习	(48)
关于日本教习	(139)
中国的新教育和日本教习	(154)
中国的近代化和松本龟次郎	(191)
中岛裁之和东文学社	(248)
《笔谈遗稿》	(280)
神戸理事府	(295)

前 言

这一百年来，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在苦难中奋斗和摸索过来的。在摸索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其实，这个教训，一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知道了，可是并没有重视，更谈不上汲取了，以致使苦难的过程，在中国延续了这样久。

鸦片战争的炮声曾惊动过中国，也惊动了日本。可是在中国，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以外，统治者一点没有醒悟，依然以天下帝国自居。没有直接受到炮火蹂躏的日本，却汲取了邻邦的教训，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急起直追，在不长的时间内摆脱了挨打的局面。不但这样，而且还参加了侵略者的行列，直接打击和侵略不久以前还是其文化母国的中国。

甲午一战大败之后，才使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重视落后要挨打的教训，要求把民族、国家从落后中脱身。可是要怎样才能脱离落后的局面，尤其是在阻力重重中摆脱落后，他们并不清楚。幸而向来受中国文化影响，不久前还同处积弱地位，而现在已跃居强国之林的日本，就在邻近。一批知道落后要挨打，而想急速脱离落后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日本作为效法的范本，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他们之所以选择日本，尽管说是由于路近、费省、文字风俗相似等等理由，但这都只是表面上人所共见的，实际上还是在于日本不但能在短期内从落后的境地中摆脱出来，而且还能摇身一变，由一个被侵略者而成为一个有力量欺侮、侵略邻国者。因此，中国的知识分

子想从日本的经验中,学习怎样才能不挨打,怎样才能富国强兵。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懂得要改变国家的面貌,要使国家能长治久安,要使国家能做到真正的富国强兵,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着手,所以他们把向日本学习的重点,置于教育上。

这种想法,从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

甲午以前,中国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曾经提出过在教育方面,向当时先进国家的西方学习的建议,并且也陆续付诸行动了;可是在顽固的保守势力反对下,很快被扼杀了。甲午以后,虽说局势有所变化,可保守势力的阻力仍然很大,因此他们想以教育作为重点,由根本上向日本学习的建议,要成为行动,还是困难重重的。不过顽固的保守派,他们迷恋于权和势,当他们觉悟到不改变目前的情况,就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时,就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这些建议。在这一背景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东渡到日本,不是求学,就是游历;成批的官吏,也在游历考察的名义下涌到日本。二十世纪初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麇集东京,其原因就在此。让国家民族的下一代,到先进国家去学习,培养他们改造旧社会的本领,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随之而来的动摇腐朽的统治基础的副作用,吓坏了顽固的保守派。在他们看来,改革,不要说革命了,比亡国更可怕。于是,又施展故技,企图阻止、破坏青年们到日本去学习。但是,时代是在前进的,人民的觉悟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地,1881年撤回全体留美学生和1882年停止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故事不可能重演,闭关锁国也不再能办到。在这情况下,一面为出国留学设置障碍,一面又邀请大批日籍教师前来帮助建设中国的新教育,使改革局限在统治阶层的控制下,按着他们的意图进行。既可以欺骗人民,蒙蔽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而又没有动摇统治基础的危险。不

过,历史有其一定的发展规律,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留日学生和应聘而来的日本教习,为中国的近代化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虽然都是失败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人不少,但很少有人提及两国文化逆转的情况,也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留日学生,更不必说曾经在二十世纪初活跃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教习了。其原因,可能由于这些是失败的历史,不愿深究,也可能是因为资料缺乏,难以着手。

事情的确如此,可是历史总是历史,客观的存在是无法变更的,何况过去的历史,即使是失败的,也应该研究,以便能汲取教训。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接触过这一段历史,收集过若干资料,也写过一些文章,想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尤其是关于日本教习方面的历史,因为其由盛而衰,为期极短,可是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尤其是新教育的建立过程中,它的贡献是巨大的。这种历史不能湮没,也不应漠视。但在我着手研究的时候,虽然距离这段历史时期还不远,大部分当事人也都仍在,可是能搜罗到的资料却极少,尤其是有关日本教习方面的,例如想求一张完整的日本教习的名单,亦不可得。实藤惠秀先生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根据中岛半次郎先生以当事人身份编成的名单,作了增补,但显而易见还遗漏不少。要从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一份接近全面的名单是无法进行的。为此,在四十年代初期,我和实藤先生两人曾遍翻过当时能见到的一些有关书刊资料,走访和询问了能知道的当时担任过日本教习的人,编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名单,准备日后以此为据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回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没有可能发表我在中日关系史方面研究的成果,当然更不必说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日本教习那样比较敏感的专题有所探讨了,因此一些有

关的资料、照片也没有得到利用的机会。一九五六年,我希望实藤先生能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所以曾把一些在回国以后搜罗到的资料,抄了一份给他,其中包括对日本教习名单的补充。当时他正在修订留日学生史稿,回信要我在日本教习这问题上下些功夫;他表示,在他新撰的留学生史中,不想再详述日本教习的事,希望由我来写。这大概就是我和他在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大重要问题上的分工。

很遗憾,在接到他信不久,我就不可能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我的研究了,这问题就搁了下来。以后的事,更不必说了。我损失了所有的书籍和资料,其中当然包括有关留日学生和日本教习的;我也无从知道国外在这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一九七八年,我重新恢复学生生涯,得到实藤先生的信后,才了解到这二十多年来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虽然在留日学生的研究上,有了不少进展,可是在日本教习这问题上,仍然是一片空白。实藤先生重提旧话,要我在日本教习的研究上作些努力,发表文章,作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环。他并且说,因为有前约,所以在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对日本教习提得很简单,不像过去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中那样,希望由我补充。

当时,我虽有此心,也感谢他的好意;可是我已丧失全部卡片、书籍、笔记和照片,只凭记忆是写不出文章的。想起他那里还保存有和我同样的部分资料和照片,特别是增补后的名单,所以告诉了他实情,同时要求他把他保存的资料和照片都复制一份给我。很快收到了他寄来的资料和照片,并且告诉我,到目前(1979)为止,日本方面也还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所以无法找到新发表的有关文章。虽然说他寄来的,没有“小将们”烧去的多,但毕竟有了从事研究的基础,比从零开始要容易得多。

不久，他又替我从东京的图书馆中，把我在四十年代发表过的文章复制寄了来，使我又回忆起在一些小问题上的想法，有机会重新考虑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后来，我利用这些资料（名单是又经过增补、修订的），以我现时的方法和观点，写出了两篇有关日本教习的文章，分别在国内和香港的刊物上发表。实藤先生见到后，又很认真的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并且把正在从事同样研究的日本文部省教育研究所的阿部洋先生介绍给我，还请阿部先生把当时外务省档案中的有关部分复制寄给我，使我对日本教习的名单又得到了一次补充。

我的想法是，日本教习的研究，应该是作为中日关系史，特别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来加以探讨。因此，首先要了解近代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的变动情况。同时，日本教习和中国留日学生间的关系是极密切的。这几十年来我虽不再研究留日学生的问题，也不再写这方面的文章，但我仍愿提醒大家，要注意两者间的关系，特别是内在的联系。对于历史的观点，我不承认个人能决定历史，但也不否认个人能对历史起一定的作用，在日本教习的问题上也这样。这里收录了几篇，可能提得不很恰当，但的确是我想

我很高兴的知道，日本方面对于日本教习的问题，也开始加以重视。文部省特别拨出专款指定教育研究所加以研究，阿部洋先生在一九八七年春天专诚到中国来收集资料，包括我这份名单。大概在我这本书出版的前后，文部省教育研究所有关日本教习问题的研究报告，亦将公诸学术界。我相信，日本教习这问题将不再是留在两国历史上的空白。

我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虽然道路不平坦，但毕竟还是走过来了，而且还将走下去。其所以能如此，主要当然是在于我自己的意志和决心，从我年轻时代立志以探讨

中日关系史作为我终身事业之后，无论经历怎样坎坷，也没有灰心和气馁，没有中辍我的事业；这就不能不感谢师友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其中最应该一提的是实藤惠秀先生。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们一同访求书刊资料，一同讨论研习；在我十分困难的时候，他勉励我，要我知道：需要我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要我千万不能气馁；在我书刊、资料丧失殆尽的时候，他尽快把我们共同制作的资料、照片复制后送来，还提供我不少其他便利。尽管在战后我们没有再见面，他也看不到他所待望的有关日本教习专书的出版（文章，他是见到了的），但在这本专集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还不能不提到他，作为纪念，也表示感谢。我没有辜负他的好意，也没有违背他的意愿，尽我的可能把有关日本教习的情况、资料介绍给学术界，希望能作为二十世纪初两国文化交流史中一段重要历史，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让这一段重要的史实湮没。

有关日本教习的资料，我想在我国国内还是可以找到些的，虽然几经变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公私保存的资料、照片，都在消灭“封”“资”的口号下销毁了。但我相信必然还有“漏网”的，特别是在比较僻远的地区。我希望这些资料，有一天能公开出来。这不仅在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上，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是弥足珍贵的。在档案中，主要是地方的档案和某些曾经聘用过日本教习学校的档案，只要没有被销毁，很可能会找到一些的。例如我曾在我母校前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档案（被销毁以后仅存的一些）中，找到了名单中所漏列的日本教习名字。在历史档案馆中，也可以见到一些日本教习的名字。我相信在其他档案中，还能找到这类材料，因此希望读者们能加以协助，使这份名单更接近事实。

这里收录的一些文章，无论在资料或对一些问题的提法上，只要有使我信服的理由或证据，都是可以商榷、修改的。尽管我从事

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时间不算短,但在水平和观点、立场方面,不足的地方还不少;我的余年虽不很多,但还有时间来作修正,因此请读者们随时给予批评指教,我必将以十分感谢的心情来对待。

汪 向 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底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

一提起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常有人说中日两国“同文”。所谓同文，就是说文化关系相同；另一个说法是，过去日本因袭了中国的文化，近代中国又学习了日本的文化，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就是互相学习，没有什么特殊可言。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理由，但却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实，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过去日本曾向中国学习，近代中国也曾从日本输入西欧的文明，但都没有原样的保存下来，怎么能说没有特殊呢？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文化关系上，渊源相同，有共同相通之点；但也有其特殊与不同的部分。可以说，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虽然不能否认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文化关系主要是适应其民族国家的特殊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的，跟输入的原型决不相同。

每个国家都有其生活环境、社会组织；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就是产生于这种生活环境、社会组织中，适应并且服务于这个环境、组织的。随着文化的发展，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也不断改变，新

的环境和社会组织又产生新的文化。如此循环不已，才有人类的进步。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国家，必然会从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国家吸取营养，尤其是从其邻接的民族、国家中吸收。但由吸收而得的外来文明，如果不能适应其环境和社会组织，就不会得到发展；时间一久，必然遭受淘汰。对于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应该作这样的看待。

中国和日本，虽然地处邻接，民族血统中，也有彼此相混成分在内，但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社会组织不同，生产水平也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过去，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尤其是在古代，无论在文化上或其他方面都是很落后的，可是和其相近的中国，却早就具有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和发达的生产技术；因此日本从中国吸收先进文明，以帮助其社会的发展，是件势所必然的事。隋唐时代，中国文化的大量输入到日本，就是这个原因；不过输入到日本的中国文化，并没有原样的保存下来，而是被日本人吸收消化，成为产生日本文化的营养品和肥料了。也就是说，这种先进的文化被日本吸收后，为了适应其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了日本独特文化，不再完全是输入当时的中国文化。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古代同出一源，正如西欧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同出一源一样。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文化的水平、程度远远落后于日本，以致有些日本学者觉得与中国文化同源为耻，声言日本文化是一种没有受过任何外来文化影响，自行创造的独立文化。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客观的存在是谁也无法否认，也不能加以改变和掩饰的。作为日本文化标志的文字，尽管一再简化，删减使用汉字的频率，但汉字还在使用，而汉字就是来自中国文化的一个痕迹。此外，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虽然第二次大战后有很多变化，但仍然保留着和中国相似的，或者可以称得上中国式的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在中国已